

# 信念、坚守与收获

——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曹元勇 / 上海文艺出版社

**摘要** 本文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起,讲述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取得莫言作品版权的过程中,编辑应当具有怎样的信念、怎样的坚守才能有所收获。

**关键词** 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 编辑 出版社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属于中国作家莫言的消息公布之后不久,上海出版界的前辈郝铭鉴老师在他的个人微博里写道:“几次在书展上,看到曹元勇陪着莫言,陪得那样耐心,那样虔诚。我印象中,当时莫言并没有新作交文艺社,即使有也不一定能赚到钱。但曹元勇在等待,文艺社在等待,从郑宗培到曹元勇,等了几十年,终于等来了茅盾奖,等来了诺贝尔奖。等待,是编辑的一种可贵的品质。”

郝铭鉴老师的这段话既让我受宠若惊,又让我感到自豪。受宠若惊的是我那些平凡的工作被郝铭鉴老师这样的前辈看到并记住了,自豪的是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文学上的坚守和追求终于有了标志性的收获。的确,因为得到实力派作家莫言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这几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硕果。2011年,他的长篇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使上海文艺出版社乃至上海出版界在这一国内最高文学奖项上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2012年,自10月11日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信息公布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本“莫言作品系列”一下子成为图书市场上的抢手货;一个半月,接近两亿元码洋的莫言作品,不仅有力带动了文化出版产业链的高速运转,而且大大激发了广大读者阅读严肃文学的兴趣。伴随着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国内唯一一家“独自拥有十六卷之规模的莫言作品系列出版版权的体制内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声誉也水涨船高,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很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让中国文学界最为纠结的一块心病,仿佛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就拿不到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就没有资格与西

方文学平起平坐似的。如今莫言率先为中国文学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文学受到鼓舞,让中国文学在国际交往中的自信心得到提升。但是,对于优秀的作家和有信念的文学出版来说,从事文学工作从来都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对高质量文学作品的追求,是为了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执着。诚如郝铭鉴老师所说:“等待,是编辑的一种可贵的品质。”对文学编辑来说,对精神文化的执着与敬重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功利主义观念无孔不入的环境下,这种执着与敬重尤显得重要。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与莫言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所秉持和坚守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注意到了在文坛上初出茅庐的莫言。那个时代也是整个社会充满文学的朝气和热情的时代,每一位有创作潜力的作家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自己的伯乐。当时的莫言还没有发表奠定其文坛地位的“红高粱系列”,还在用本名管谟业。1984年,时任《小说界》编辑的郑宗培(后来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怀着发现新作者的热情,向在文坛上尚没有什么名气的莫言约稿,并得到他的一篇短篇小说——《石磨》。这篇小说刊登在《小说界》杂志1985年第5期上。这可以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作家莫言合作的序曲。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莫言再续前缘、重新开始合作,是在上个世纪逼近尾声的时候。1997年夏天,我读完博士研究生,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编辑部工作。1998年春天,我赶到北京出差的机会,登门拜访了在北京安家的莫言。那时,莫言已经出版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丰乳肥臀》《酒国》等重

要作品,在文坛上已是相当有名气的大作家。出于对文学的喜好,我当时读过莫言已经发表的大部分作品,在读硕士研究生时试着写过关于《十三步》的评论,读博士研究生时又与两位师兄弟搞过一个关于《酒国》的对话讨论。而且,我发自内心地推崇他在《酒国》中所做的艺术上的大胆实验,钦佩他在《天堂蒜薹之歌》里所表现的作家的良知和无畏的勇气。有这些打底,尽管此前从未与莫言谋面,我还是在到北京出差时,不揣冒昧地登门拜访了他。

记得那次见面我刚开始心里还真有点紧张,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面对面坐在自己心目中了不起的小说家面前。不过,莫言身上的谦和气质很快消除了我的忐忑心理。在那次见面过程中,我们一边喝着莫言亲自冲泡的茶水,一边聊了很多文学方面的问题。我们从他出版数年不被评论家关注的《酒国》谈到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作品《哈扎尔辞典》,谈到未来小说开放的文体结构,从乡村的苦难而复杂的现实,谈到日本译者翻译《丰乳肥臀》可能碰到的语言难题,从中国民间的狂化、戏谑、苦中作乐的现象和精神,谈到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研究,等等。那次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两个小时的交谈,让我在文学观念上受益无穷。在那之后,我几乎每年都能见上莫言一两次,每次见面都充分享受与他交谈国内外文学等话题的乐趣。随着与莫言见面次数的增多和对他的作品的不断阅读,我不仅越来越深地折服于他在文学上令人惊叹的旺盛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越来越强烈地为他身上的谦卑品格所感染。我发现,对莫言来说,谦卑绝不仅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美德或姿态,同时也使他获得了一种观察现实和世界的独特方式。而且,他还把

这种谦卑自觉地渗透到他的所有写作之中。自觉的谦卑使他不需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把写作的根深深扎入肥沃的民间土壤。

1998年春天的那次见面,重新开启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莫言合作的局面。最初我只是约他为《小说界》杂志撰稿。一年之后,我又开始酝酿编辑出版他的短篇小说系列作品。这套系列作品就是由我责编,2000年出版的“莫言精短小说系列”——《老枪·宝刀》《苍蝇·门牙》和《初恋·神嫖》。在这套短篇小说系列的编选思路,我和莫言可谓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当时我们的主要想法是,无论文学界还是政府或读者,对长篇小说的出版极其重视,但对在创作中要求极高的短篇小说却比较忽视;而我们中国文学在短篇小说方面不仅富有深厚传统,而且有许多短篇小说方面的经典名作,比如明代有“三言两拍”,现代文学中很多作家更是以短篇小说著称,鲁迅先生的小说则更是只有三本短篇小说集。至于外国,有很多优秀作家在短篇小说方面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令人敬服,如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等;而且外国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也经常奖给一个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哪怕那是作家的第一本书。而我当时之所以选择编辑出版莫言的短篇小说,主要也是基于当时我对莫言作品的认识和由衷的喜爱。在我看来,莫言的短篇小说故事饱满,风格多样,如同从肥沃而复杂的中国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朵朵奇葩,那些故事既有荒诞离奇却又逼真入神、不乏黑色幽默的传奇述说,也有对乡村淳朴人情的感人描摹,更有对乡村残酷现实的犀利挖掘。记得在“莫言精短小说系列”出版后,我曾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自办的《书海知音》写过一篇题为《描写乡村的

大师莫言》的文章。在文章中,我写道:

如果要我选择一位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莫言。这不仅仅是因为莫言创作的那些想象奇谲丰富的长篇巨制《红高粱家族》《十三步》《食草家族》《丰乳肥臀》,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创作了那部描写农民苦难的带血的愤怒之书《天堂蒜薹之歌》,更不仅仅是因为他创作了唯独他可以、而所有别中国作家、当然也包括所有外国作家都不可能创作得出来的那部十足完美而又完全开放的、使批评家们瞠目结舌的《酒国》。我选择莫言,是因为除了上述长篇杰作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像北方的乡村一样复杂丰富的中短篇小说,同时他又是一位始终保存着一颗谦卑的乡村之子的淳朴心灵的作家,是一位始终把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根深深地扎入肥沃而广阔的乡村现实的作家。

今天,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等,早已作为当代汉语文学中的经典被社会所接受;而且这些长篇小说大都已被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受到外国读者的重视和赞赏,但是莫言创作的近百万字的中短篇小说的价值却不是很多人所了解的,尽管这些中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巨制比较起来丝毫不逊色。毫不夸张地讲,我们完全可以拿莫言的中短篇小说去与契诃夫、莫泊桑等外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们的作品去媲美。甚至,对于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来说,莫言的中短篇小说对生活的反映面之广阔、对现实的揭示之深刻、在艺术创新方面之

丰富,是莫泊桑、契诃夫们也无法匹比的。

“莫言精短篇小说系列”三本书的出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莫言成规模出版合作的开端。2004年,在这套系列印刷两次并销售殆尽时,我又与莫言联系,建议把他的所有短篇小说,包括他刚出道时的短篇作品,全部汇集起来,以“莫言短篇小说全集”的形式出版,目的是让喜欢他的读者和评论家能够系统地看到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全貌。于是,就有了200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短篇小说全集”——《白狗秋千架》和《与大师约会》。与这两本短篇小说集同时出版的还有莫言的代表性作品《红高粱家族》和长篇小说《食草家族》。这四种书组成上海文艺版的第一批“莫言作品系列”。

那时候,我们所出版的莫言作品,虽然都是他的旧作或短篇小说汇编,但我们始终认为优秀的作品都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值得不断向读者推荐;而且,在我们看来,莫言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已经牢牢地,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奠定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能够出版他的作品绝对是我们的荣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莫言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由我策划并担任主要责任编辑的“莫言获奖长篇小说系列”在2008年正式出炉。这套书收入了莫言获得过海内外各种重要文学奖项的五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此为上海文艺版的第二批“莫言作品系列”。紧随这套书,我们很快又把莫言其他四部未曾获得任何文学奖项的长篇小说汇编在一起,以“莫言长篇小说系列”的形式出版。至此,我们等于把莫言

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旧作争取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即便我们可能永远无缘出版莫言的长篇新作,但能够把莫言的全部旧作不断出版也是值得去做的工作。然而,日久见真情,信念有回报。我们的真诚、我们对优秀文学的信念、我们对纯文学的坚守,不仅加固了我们与莫言的友谊,而且赢得了丰厚的收获。2009年,莫言把他酝酿十年、笔耕四载的新长篇小说《蛙》交给我编辑出版;2010年,他又把全部中篇小说作品分三卷交给我们;2011年,在《蛙》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他更是爽快无比地把全部小说作品(十六册)的版权交给了我们。

莫言在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章里写过:“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与出版社里人的关系。人好社才好。”我想,在这“人好”两字的背后既蕴含着莫言对上海文艺出版人坚守文学信念的认同,也蕴含着他对我们各个方面敬重作家、爱护作家而非像唯利是图的商人那样只知道功利主义地利用作家的做事原则的认同。现在,莫言在继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又一举摘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我和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实可谓“与有荣焉”,收获丰厚。

